

“两会”表决方法的沿革



2011年,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代表们用电子表决器投票

从鼓掌到投票,从投豆子到按电子表决器,“两会”表决方式的“进化史”见证着民主法制的前行步履。

“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碗里头”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三三制”的政权模式——也就是说,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基层政权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

在有关当时的一些电影资料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群敦厚、朴实的农民举行“豆选”。几位乡干部背后的条桌上都放着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

年村民每人都攥着一颗黄豆。他们有点腼腆,又有点陌生地依次走过乡干部的背后,如果同意谁当村长、乡长,就把豆子放在谁身后的碗里。最后,由得豆最多的人当选。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句上世纪40年代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生动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在艰苦环境下运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场景。

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既可以减少选举成本,也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甚至操纵,能更充分地体现民意。有些村民怕别人知道自己将豆子投给了谁,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

土改后农民选举人民代表,因为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多用“豆选法”。

“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到了1949年,政协普遍采用举手和鼓掌的方式,表决选举任免和重大公共决策等。

有人说,鼓掌通过其实不够民主,在众目睽睽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人会公然

违背主席台上的意图举手反对某议案或某人选,表决结果“失真”,很容易产生“一致通过”的假象。

还有人把举手表决的从众心理比喻为“搭便车”,“别人都齐刷刷举手,唯独你不举手,就难免尴尬”。

实行无记名投票后也有弊端:若代表同意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票上可不画任何符号;不同意选票上候选人的,可在选票符号栏内画“×”;对选票上的候选人弃权的画“√”。这种表决方式导致代表投票隐私不保。那些要投反对或弃权票的代表必须动笔,这样一来,一旁的工作人员很容易获悉。直到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才扭转这一态势,会上表决通过了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

1990年,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每张桌面上,都安装上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这是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

从近些年的情况看,一般都采用按

电子表决器和无记名投票这两种方式。在诸如对宪法修正案的表决,决定国务院总理,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时用纸质投票方式。而其他决议草案,如法律案、预算案等等,则采用按电子表决器的方式。

使用电子表决器,从表决开始到表决结果揭晓,仅需短短几秒钟,表决结果通过会场前方的两个大电子屏显示出来。计算机系统只会对赞成、反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器这四种结果进行数字叠加,不会留下代表的表决记录。相较于传统的举手、鼓掌等方式,电子表决投票更加客观、真实。

2002年1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坦率地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

好的投票环境,有利于代表委员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另一些代表则认为,除害怕旁边的代表打小报告,否则没必要顾虑。内蒙古农民代表顾双燕说,“要是有所顾虑的话,就不配做人大代表。”

人民网 2014.3.12 文 / 王一

毛泽东创设“死缓”

在这些具体政策界限中,毛泽东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为此,他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他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

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而后要怎样办都可以。”毛泽东自己也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

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的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做出决定。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

中央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死缓”刑名,并形成《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来,这一刑名一直被中国法律所沿用。

据《党史博采》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要用独立思考的方法看历史

日前,被认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78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两部新作《曹寅与康熙》和《胡若望的疑问》在京首发。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有怎样不同的思维能对我们有所启迪?史景迁说,自己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用批判独立思考的方法去看历史,“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在中国经常宏观地大叙事;在国外,整个学习的是对某个历史当中个体的关注,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生活史很重要的。”

史景迁说,自己从6岁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当时看到一本童书,讲的是艺术史,里面有一些中国书画的笔墨,他非常着迷。那个年代还在二战期间,中国是二战的英雄,同时又看到那些画册,于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后来,史景迁开始进入近代史的研究。在《改变中国》一书中,他从利玛窦开始写到俄国专家来,这些人可能都带着好意来改变中国,可是有些很离谱,拿自己想象的优越来改变中国。史景迁将这些专家连续起来叙事就有了很多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故事,比如这次出版的《胡若望的疑问》。

史景迁说,“博士论文选择研究曹家(曹雪芹家族)与康熙皇帝,是因为我特别发现,曹寅跟康熙的关系很亲,而康熙身为皇帝对政事与日常生活写下的文字记录竟出人意料地直白写实,所以曹寅成为我第一本书的主角。”

后来,他用更多的著作研究康熙与其子雍正,“整体而言,这两人无疑皆为意志刚强的明君。1661年至1735年两人在位时期,是中国漫长历史中难得一见的盛世。”他也因此慢慢对清之前的明朝感兴趣,试着研究明亡的原因,也愈来愈想了解明朝士绅阶层失落的是的什么,“因为如不是十分珍贵,他们也不会宁可自杀(甚至是全家人寻死),也不愿受清朝统治;同时,原来的社会一定非常富足,让他们的生活太值得去玩味。或许这也间接证明了晚明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

中国新闻网 2014.3.15 文 / 佚名

赫鲁晓夫酒后将克里米亚赠乌克兰

赫鲁晓夫“送给”乌克兰的礼物

克里米亚是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一个半岛。17世纪,为了将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版图,沙俄同土耳其进行了9次战争。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苏联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1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半岛作为礼物划给了乌克兰共和国。当时,谁也没想到苏联会解体。苏联解体后,俄想把克里米亚置于自己的“三色旗”下,岛上居民也大都愿意回归俄罗斯,但乌克兰却不同意拱手相让。最后,在乌对黑海舰队的分割等方面作出让步以及允许塞

瓦斯托波尔港由两国海军共用之后,俄方最终同意放弃对半岛的主权要求,双方于1995年签订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互不改变现有边界状况,其有效期为10年。

日前,俄杜马议员、自由民主党代表库里扬诺维奇建议,俄政府应该收回克里米亚,使其重新回到俄罗斯的怀抱。他表示:“我们不应该再与乌克兰续签条约,当年赫鲁晓夫是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将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的。”

俄罗斯人争议半岛归属

很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把克里米亚半岛看作是“自家地盘”,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耿耿于怀,认为不应该将前辈在

克里米亚战争中浴血奋战得到的成果拱手送人。

但多数俄专家和学者认为,俄讨回克里米亚半岛并不现实,也缺少法律依据。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便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俄罗斯不能再向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

俄乌矛盾升级

其实,克里米亚半岛的归属问题只是俄乌关系日趋紧张的一个缩影。自从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之后,俄乌关系渐行渐远,两国矛盾越来越升级。

除了克里米亚半岛归属问题之外,俄乌两国之间还有许多争端一触即发。去年俄乌两国“天然气价格大战”,让两国的老百姓寒透了心。面对俄



赫鲁晓夫

罗斯的能源大棒政策,乌克兰也在黑海舰队问题上以牙还牙。俄黑海舰队一直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根据协议,黑海舰队的租期到2017年期满,此后乌克兰很有可能将其扫地出门。

人民网 2014.3.4 文 / 姚雨杉

成吉思汗成功得益于“好天气”

美国科学家3月11日表示,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期的崛起并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是依靠了“好天气帮忙”。

美国研究人员在研究了蒙古中部一些古老树木的年轮后发现,成吉思汗的成功恰逢1000年来最温和、最潮湿的天气。

这种气候有利于青草的繁茂生长,为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大军的战马提供了丰富的饲料。

科学家表示,在成吉思汗统治之前的1180-1190年间,蒙古曾经遭受了严重的干旱。但在成吉思汗帝国扩张的1211-1225年间,蒙古出现了罕见的频繁雨水与温和的气候。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不会只是因为天气变化一种因素,但天气肯定为他提供了关键的帮助。

中新网 2014.3.11

存折与钱庄

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质库”(类似典当业),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柜坊”等。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即具体的一样东西,较多的则使用“凭贴”、“书贴”、“文券”、“券契”等,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的记录,可以说这就是“存折”的前身。

钱庄的雏形源自明朝中叶,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间信用机构,当时称“钱肆”“钱桌”或“钱店”。开始只是兑换货币,后逐步发展才产生存放贷业务,也就有了较正规的存折。

钱庄那折叠式的存折,比较精致的

外加硬板纸做的抽插式封套,套子外边还用各色布料包贴,装饰得很美观。展开“存折”可看到右上角由发证一方交付粘贴的每枚壹至贰角的印花税票,还有从右到左纵式排列用工整秀丽的毛笔字体记载的存取日期和款项。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和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拉开来看,那齐整匀称的折叠形式,让人很自然便产生意会,故称其为“存折”。

随着钱庄业从鼎盛走向衰落,这种折叠式的存折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存折的名称却沿用至今。

《老人生活报》2014.2.26